



继4次“围剿”苏区红军的军事行动失利后，蒋介石1934年9月在庐山召集赣豫鲁与两湖五省主席和军长秘密军事会议，制订了第五次“围剿”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所幸参加此次军事会议的其中一人早在1930年驻上海时就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的重点联络对象，他就是时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国民党少将参议莫雄。

安插在莫雄身边的特科成员取得情报后，连夜用特种药水将“铁桶计划”主要内容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除了将整套计划送南昌秘密联络站，并用电报形式把核心部分发往瑞金之外，特科成员项与年自告奋勇将情报送入中央苏区。他化装成一位教书先生，夜行晓住，翻山越岭，但是靠近苏区就发现关卡重重，插翅难过。情急之下，项与年忽生一计。他用石头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第二天双腮肿胀、满口恶臭，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他，状如乞丐，通过层层关卡，终于将藏在污秽袋子里的四本密写字典送到了周恩来、李克农的手中。

形势太凶险，“铁桶计划”一旦付诸实施，中央红军将被围困在半径距瑞金150公里地区，届时国民党军每天只须向瑞金中心推进7至8华里，每进1华里就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碉堡线，一个多月后中央红军将无回旋余地。中共中央几天前已收到相关简要密电，这回见到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计划，立即与中革军委制订了提前实行战略转移的计划。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两天后，红军中央纵队从瑞金出发，以小部队牵制、迷惑敌军，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于10月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铁壁合围”，踏上了长征路。

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在文化上反“围剿”

自中共中央1933年春撤离上海，紧接着成立中央上海局，代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同时接手包括特科在内的若干留沪中央机关的工作。工农红军主力分几路先后离开苏区，开启西征北伐之路，上海中央局及其数遭破坏后成立的上海临时中央局以各种方式关注并支持着红军长征。

在一阶段内，上海中央局与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与红二、红六军团时有联系。为了加强对党内的长征宣传，上海中央局所办刊物刊登抗日救国宣言，宣传红军长征意义，帮助党员群众了解红军长征的进展情况，鼓舞了斗志。正是由于及时获知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的消息，红二十五军决定西



左翼文化代表人物鲁迅。

征北上。

在上海中央局的领导下，上海党组织与革命群众同白色恐怖作顽强的斗争。其时国民党特务加强了针对共产党的侦缉破坏活动，上海集中上演着信仰与背叛的历史活剧，但是潜伏下来的党员同志并没有放弃战斗。特别是左翼文化人士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旗帜，在荆火中潜行、在泥泞中战斗，不怕牺牲，以韧的战斗，取得了文化反“围剿”的胜利。挫败国民党当局为配合军事“围剿”在文化领域发动的这次疯狂进攻，对于被迫踏上漫漫征程的红军是莫大的喜讯。同时，党组织在上海积极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与红军北上抗日遥相呼应。

上海成为党中央接续共产国际的中转站

遵义会议后，受党中央的指派，潘汉年、陈云先后离开长征部队，辗转来沪，主要目的是为了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重新取得联系。当年设立上海中央局目的之一，就是保持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络，将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及时转达到中央苏区的党中央。然而，1935年形势异常严峻，上海党组织几遭灭顶之灾。先到上海的潘汉年，虽然找到了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但是上海同志主要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潘汉年还是折回香港，等候上海同志与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的通知。

7月，陈云踏上上海这片热土。他辗转同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机关工作人员杨之华等取得联系，后又通过潘汉年的一位堂